

一封旧书信,击中当代人的心

襄水清清

□ 向斌



山水吟

襄阳,顾名思义,即襄水之阳。我曾多次到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,印象里只有静静流淌的汉江,却不知知晓襄水的模样。

据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载,襄阳郡义清县“有檀溪水、襄水”;又《通典》(唐·杜佑)载,“襄阳……在襄水之阳,又有汉水及岷山”。当地的朋友介绍说,襄水是一条发源于大巴山余脉的山溪河,径流约十五公里,于凤林古渡汇入汉水,再入长江。

襄水、岷山和汉江,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反复吟诵,也一次次激发我寻幽访古的冲动。

从襄阳古城出发,向南行四百里,城市的喧嚣便悄然远离,宽阔的汉江在眼前自由自在地铺展开来。行至江边,一片河滩向江心突出。立在滩头向左一望,一条约三十余米宽的小河蜿蜒而至,水面清澈平缓,静若处子,那就是久未谋面的襄水。襄水汉江交汇之地,自然形成洄水湾,常有小鱼小虾在此索饵。对岸的枯苇中,有点点麻鸭在悠闲地游憩。还有一位白发老者独坐岸边,临江垂钓,宛若飘然世外。

朋友说,这里便是凤林古渡。历史上,曾是控扼汉江与襄水的咽喉,南来北往的商旅在此水陆辗转,得意或失宠的宦游人上演过饯行与别离,还有三国刘表伏击孙坚的刀光剑影,想来依然让人不寒而栗。

江面上雾气蒙蒙,身后的岷山若隐若现,“江流天地外,山色有无中”的美妙意境就在眼前,宁静、平和而舒展,仿佛历史上的一幕幕活剧从来就不曾发生过。

襄水之畔,岷山逶迤。我们拾级而上,行至半山腰,一座黑瓦红墙、古色古香的小院迎面而来。门楣上高悬一匾,黑底金字,上书“晋太傅羊祜祠”。穿过院门,庭中建有飞檐翘角的木亭,护着一块条形石碑,碑顶刻着三个大字:堕泪碑。此碑是为纪念三国末期西晋征南大将军、太傅羊祜而立。碑文是西晋文学家李兴所撰,记述了羊祜镇守襄阳十年的政绩、田畴养民,筑城国防,位高而恭,怀德以远,勤政爱民。当时的襄阳一带,存在一种陋习,前任地方官死后,继任者认为官府不吉,多毁坏重建,劳民而伤财。羊祜到任后立即严禁禁止,认为“生死有命,非由居室”,深得士民欢迎。千百年来,此碑曾多次毁坏,又多次重建,现碑是第九次复建。孟浩然有诗云:“羊公碑尚在,读罢泪沾襟。”

出了羊公祠,我们一行继续往山顶岷首亭进发。岷首亭,七层六角。环顾四周,江山如画。历尽风霜的古城,清纯优雅的汉江,绵延不绝的岷山,融北方的雄阔与南方的秀丽于一身,大气而不失精致。

“前面的山腰上是始祖伏羲塑像,往西边十余公里处是襄水源。”我顺着朋友所指的方向,远远望见前方的崖壁上果真鼓出了一大片石山,酷似一尊老者雕像,却又与整座山峰浑然一体。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!我连连称奇。

襄水文史馆是一栋灰色小楼。一点儿也不意外,像所有大江大河的源头一样,襄水的源头就是两条汨汨细流,淙淙而行。但馆内展陈的资料却着实让我感到意外。在七八年前,襄水河畔竟然棚户连片,污水遍地,襄水还是一河臭水。岷山上也是到处开山炸石,石破天惊,尘土飞扬。通过这些年的全力整治,才让灰头土脸的襄水重获生机。岷山上原本没有伏羲造像,那是为了医治挖山采石的创伤而打上的补丁,只是因为构思巧妙,产生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。

真是不看不知道,襄水和岷山还曾有如此多舛的命运。

展厅不大,图片却很丰富,一张黑白的照片深深地吸引了我。画面是一堵石墙,中间一块横条石上刻着“民不能忘”四个字,字体古拙倔强,力道十足,有一种穿透时空的力量。

“这块石匾镶嵌于汉江大堤上,是老百姓为怀念郑敦允而刻。郑敦允于道光八年(1828年)任襄阳知府,其在任期间,为根绝水患,将土堤加固成石堤,历时两年建成。没料到1831年发了一场特大洪水,新修的大堤塌陷过半。已调任武昌粮道的郑敦允深感自责,执意调回襄阳修堤,因积劳成疾,病逝于筑堤工地。百姓把他修筑的大堤命名为‘郑公堤’。”

听着照片背后厚重的故事,在场的人都陷入沉思,默然无语。

“能不能去实地看看这块石匾?”我问。

“可以,就在附近的江边。”

很快,我们就到了汉江公馆门码头。沿着磨得溜光圆滑的青石台阶下到江边,我找来找去,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块石匾。近旁有位热心人看出了我们的意图,走过来,指着脚下的陡岸说:“在下面的石坎上,要站在水里才能看清楚。”我只得俯下身,趴在石岸上,四下张望,还是看不见。又欲探身用手机拍摄石匾,几经尝试,也始终未能如愿,幸好从网上搜到了一张实景照片。

端详着色调斑驳的图片,我心潮翻涌。这确实是一块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心石,它坦然委身于脚下的堤岸,从来不曾刻意追求所谓的高光时刻。然而,正是千千万万这样平凡的石块,用身躯挺起了巍巍江堤,捍卫了一方安澜。

当年,孟浩然登岷山,写下了“人世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的诗句。羊祜,郑敦允,还有许许多多具有良知的人,虽然他们都已没入历史的烟尘之中,但堕泪碑还立在那里,民不能忘的石匾还嵌在那里,老百姓的口碑依旧在传扬。

“襄”的本意,是向上。襄水,也是一条逆山而行的河流。襄水无言,又似乎在向人们昭示着某种信念,为人处世,不可随波逐流,而要向上向善。

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襄水清清,绵绵不绝。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剧照。



独特而巨大的情感张力。笔墨书信的唯美,在于它把瞬间的情感,凝固成了永恒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一面镜子,照见了我们匆忙赶路时丢失的“情义”。写给阿嬷的情书,其实也是写给所有重情重义的中国人,写给那段虽苦犹荣的岁月。

这部影片也堪称当今国民教育的一堂生动

感。如84岁的演员吴少卿(饰老年阿嬷),她的表演不是“演”,而是“活”。还有饰演青年淑柔的王晓慧,在面对丈夫在泰国另组家庭的“合照”时,她没有号啕大哭,只是淡淡一句“这么久才告诉我”,转身走进大雨中无声哭泣。这种将悲伤吞进肚子里的隐忍,是独属于那一代人的坚韧。更令人惊艳的是饰演南枝的演员李思潼,拍摄时她年仅20岁,还是大学生,没有任何表演经验。然而就是这个从1000多人中海选出来的素人,用最朴素的方式走进了一个跨度数十年的角色。

风物之美,是绚丽多姿的潮汕风情。这部潮汕方言电影,也俨然是一幅流动的潮汕风情画卷。从拜月娘、出花园的成人礼,到腌制橄榄菜、品尝工夫茶的日常,导演用镜头细腻地捕捉了潮汕独有的民俗。这种地方风俗的呈现,不仅是为了视觉上的“绚丽”,更是一种文化寻根。那份对故乡风物的眷恋,是中国人共通的记忆密码。

文墨之雅,是见字如面的中式浪漫。在即时通信泛滥的今天,电影重拾“书信”(侨批)这一传统媒介,展现了无与伦比的仪式感与美感。影片中的书信念白极具文学性,如“江海万里,心中念你,便不觉遥远”,如“暹罗虽远,心有所寄,身若比邻,切要平安,即为团圆。”……这些文字,工整、典雅、克制,却蕴含着中国人心中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何以动人

子没有请大牌明星助阵,基本上都是纯素人出演。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:好作品不一定非要靠流量明星。真正的流量,其实就在于能否精准踩中大众的情绪,产生共情和共鸣。这部电影感人之处,就是借助侨乡史,用真情、真心和真理去打动人心,在人文深度与网络传播之间,找到了平衡。所以,它成功获取了流量和票房。

还有一点让我感触很深,就是影片里那种扎得很深的文化根脉。像“过番”“侨批”“唐山”等等,用的都是方言词,有着极为鲜明的地域性和极高的辨识度。听到方言,我相信大多数观

影者就已经知道故事的背景。这是细节,当然,也包括木生与谢南枝合办的中文学堂的细节,这些细节都不是点缀,而是一种文化线索。例如“唐山”这个词——它不只是地理上的名称,更是指由武夷山、太姥山、戴云山连成的那片故土。也正因如此,他们办学、教中文,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故事情节,而是要把老祖宗的东西接住、再往下传的一种责任。传下去,文脉才能断,这就是这部影片所想表达的文化力量。

当然,片中还有诸多动人之处。例如那一口地道的方言。全片在语言上没有任何冗赘的修辞,不华丽,却句句直抵人心。电影借方言和

心理医生

□ 王征珂

在春天的汉江河边,春风,是你的心理医生,望闻问切,为你出诊。河风,修剪你脑海中疯长的杂草,理清你思想的一团乱麻。吹走你川字眉上堆积的愁云,牵着你,走出此路不通的死胡同。

清潭湖

□ 吴敬秋

想象一下,清潭湖的水是多么清冽,深不见底,甚至看不到水草。只有浅沙,在湖边偎着细浪。实际上,清潭湖是武鄂高速边的一个地名。我每次路过,总免不了多想你那潭湖水,多像你的眼神。

诗苑

类比

□ 刘重庆

泥土通常是饱满的,而一株植物所落之处,茎叶被热浪烧烤,执念被雨水浸泡,痛楚藏在暗处,膨大成辛辣的块茎。泥土滋养的植物,总有它的来处和归途。譬如我一路走来,棱角被泥沙磨平,风散落于指缝间,但,从未停歇跋涉的脚步。不同的,是:姜,愈老愈辛辣,我,愈老愈糊涂。

千年一辩 鹅湖仰止

诗开始辩论的。

陆九龄为了这次相约,头一天晚上就写了一首满是心学禅意的诗,第二天辩论时,他率先抛出了他的诗作:“孩提知爱长知欤,古圣相传只此心。大抵有基方筑室,未闻无址忽成岑。留情传注翻榛塞,着意精微转陆沉。珍重友朋劝切切,须知至乐在于今。”他一上来就抛出心学观点,“孩童时就知道爱,长大后懂得敬,古圣先贤代代相传的就是这颗本心。”随后,陆九渊把和其兄的诗也念了出来:“墟墓兴哀宗庙耻,斯人千古不磨心。清流积至沧溟水,拳石崇成泰华岑。易简工夫终久大,支离事业竟浮沉。欲知自下升高处,真伪先须辨古今。”陆九渊比其兄更进一步,认为本心并非圣贤独有,而是所有人都有。他还直言,朱熹的理学是支离,烦琐又无益;自己的心学见心见理,达于简易。

朱熹听后大为不悦,恨不得拂袖而去。但朱熹何许人也?当世大儒,一生逞强好辩,面对负气自傲的陆氏兄弟,他展开了激烈的辩驳。由是,南宋一场震古烁今的哲学思想大交锋、大辩论在鹅湖书院上演了。其实,他们都认同理是宇宙真理,差别就在理与心上。朱熹以心与理为二,理是本体,心是认识的主体;陆九渊以心与理为一,以心统贯主体与客体。朱熹认为理生万物,心具众理而

异。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,认为理为宇宙本体,主张格物致知、由博返约(渐悟);以陆九渊、陆九龄兄弟为代表的象山学派,认为心即理,心外无物,主张发明本心,易简直截(顿悟);以叶适、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,反对空谈义理,主张经世济用;以及以胡宏、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,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等。

南宋淳熙二年春,吕祖谦专程从江西去福建拜会朱熹,在朱熹的寒泉精舍待了四十多天。两人一起研讨学术,还编辑了《近思录》。回来以后,吕祖谦觉得有必要求同存异,把学术思想统一起来。于是,那年夏天,他邀约朱熹与陆九渊、陆九龄兄弟齐聚鹅湖寺,想要调和两家学术分歧,以使“会归于一定其适从”。

彼时,朱熹已届四十六岁,治学二十载,理学体系已然成熟,声望日隆,主张“格物致知”;而小朱熹九岁的陆九渊,心学初兴,锋芒毕露,秉持“心即理”的主张。让吕祖谦没想到的是,这两座思想高峰正面对撞,注定不同凡响,成为中国文化史、思想史、哲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,影响千年。

我原本以为那场千年之辩,是在吕祖谦的主持下由正、反双方展开辩论的,就像举办一场辩论大赛一样。但其实,他们是抛“诗”引玉,从

历史文化读本,叫《学院印象》,算是把脚下这片土地摸清了。几分。

六年后再调到区委,那份念想还在。我提议编一套《西陵记忆》,来传承老城的文脉。领导同意后,我便请三位作家写成了三卷本。后来虽调离了,我仍然守着这套书,直到它印出来。

日子如白驹过隙,一晃在宜昌住了二十年。走得久了,脚下的路便不只是路——它们成了线,串起一座城的记忆:两千多年的建城史,巴楚文化的交汇,屈原昭君的故里,三国古战场,川江航道的开辟,宜昌大转运的奇迹,葛洲坝与三峡大坝的丰碑……忽然间,我觉得脚下的土地厚了。那不是泥土的厚,是时光的厚,文化的厚。

四年前,我调到市文联。那年春天,我站在已被拆除的墨池挂旧址上,巷子很静,远处似乎飘来

评书的调子,拖得悠长。我忽然想:该用文学笔调写一本宜昌历史书,让普通人能读下去。写写这座住了大半辈子的城,写写她的老街老巷,写写上面长满的故事,写写她的文脉绵长。不为别的,只为了让更多人知道,宜昌不只有屈原、昭君、杨守敬,不只有大坝,还有比这些都久远的东西。

我动笔是在一个雨夜。窗外雨声淅沥,像古城墙上岁月滴落的声音。写着写着,我常会出神,仿佛那些人物都活过来,走在我身边。那些事也串起来,萦绕不去。有时走在街上,也觉得脚下的某块砖石,某个名人曾踩过。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遇。

书出版时,有五十万二万多字。捧在手里,摩挲着封面,竟有些感动。不为辛苦,只为终于为这座城留下了一点点。大约人到了一定年

荆州人写“宜昌往事”

□ 李扬

去年,我写的《宜昌纪事》一书上了知名听书平台“喜马拉雅”,还被省里作为优秀社科普及读本推介。书里那篇《川汉铁路往事》,更得了个文学奖。这些事,是先前不曾想过的。

我是荆州人,大学毕业后留在宜昌,工作,成家。从山乡到城里,日子像江水一样,无声无息地淌过。

十五年前,我在宜昌老城区的街道工作。每天穿行于尔雅街、尚书巷、墨池巷之间,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发亮,斑驳的墙皮留着风雨的痕,仅存的几座四合院,飞檐斗拱,苍老而气派。窄巷过处,抬头只见一线天,阳光斜斜打下来,照得见浮尘。那种感觉,一直长在心里。

当时常有客人来访,问起地名来历,我们却常常答不上来。于是,我领着人编了一本街道